

战国策文新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郑杰文 著



战国策文新论

郑杰文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济南



战国策文新论

郑杰文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625 印张 2 插页 36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09—02319—4
K·352 定价: 25.00 元



序一

周勋初

西学东渐之前，中国文人的思想，除受印度佛家思想影响之外，差不多一直笼罩在先秦哲学的影响之下。因此，前人每言中国学术起于先秦，研究古代学术首应注意《汉书·艺文志》中有关各学派的评述，是符合事实的。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异彩纷呈。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竞相提出独标一帜的学说，对当前的社会问题与政治局面提出整治的方案。尽管各家之说未必都是什么救世良方，但各家都曾构拟出独特的思想体系，分析现实问题时总有自己的视角，并且都曾为贯彻本学派的主张而不懈地奋斗。他们的献身精神，探求真理的毅力和勇气，都使后人叹赏。

时代不断前进，社会形势随之发生种种变化，所谓九流十家的命运，也就发生了巨大差异。战国之时并称显学的儒家与墨家，到了后起王朝确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之后，也就采取扬此抑彼的方针了。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路过曲阜时，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可见儒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墨家虽有尚同的主张，可供统治者利用，但他们着重在下层民众中发展团体，这就有可能对统治者构成威胁，而且他们不分尊卑而要求兼爱，自然遭到统治阶层的厌恶。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墨家因其不合时宜而遭到否定，也就逐步趋

于没落了。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此不可能再现，其他学派都遭到了冷遇或压制，其中要以纵横家所受到的打击最为深重。

儒家首重义利之辨。《孟子·梁惠王》章记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当时的思想家都在考虑如何统一天下的问题，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国，反对首先从利害上考虑；纵横家的情况正相反，处处地方都从政治上的利害得失着眼而分析时势，处理问题。孟子对梁惠王的答复，实际上是对纵横家的批判。

汉代定儒家思想于一尊，历代王朝也无不标榜重“义”轻“利”，因此纵横家在道义上就首先遭到了否定。其后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混乱的局面，也曾出现过一些纵横捭阖的人四出活动，但他们总要借重另外学派的理论作为宣传口号，中国历史上自汉代之后已无纯粹的纵横家出现。

先秦时期各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确是躬身励行，留下了许多难能可贵的事例。例如墨子为了“非攻”，阻止楚国攻宋，昼夜兼程赶到楚国，和执政者展开激烈的争论。又如墨者钜子腹䵍之独子杀了人，他婉谢秦王赦免的好意，坚持杀子以殉墨家的原则。农家许行率领众弟子昼夜劳苦，贯彻本学派中自食其力的主张。这些都是一般的人难以做到的。纵横家的代表则异于是，他们朝秦暮楚，唯求个人的飞黄腾达。例如苏秦先是赴秦国谋求发展，劝秦“称帝而治”，遭到秦王冷遇后，转而奔走山东六国，合纵攻秦。在后人看来，真是出尔反尔，一无信念可言。苏秦随后曾感叹地说：“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也就不会四出奔走了，可见这些纵横家志趣的卑微。儒家在政治上讲求出处大节，纵横家则唯利是图，一无操守可言。

但是我们如果不抱成见地考察战国时期的形势,看看现实生活中到底是哪些人在推动历史的前进?则应该客观地说,各家各派都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作出过贡献,有的呈现于当时,有的影响于后世。但以顺应时势以及推动当时政局急速演变而言,要以纵横家的贡献为大。战国七雄,此起彼伏,递为雄长,都有一批纵横家在出谋划策,自魏国的崛起到秦国的统一六国,不管服务于各国的纵横家如何思考,他们都在为结束混乱局面而奋斗,志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新王朝。因此,此时奔走四方,推动历史前进的,就有一批纵横家在起作用。他们在政治上发生的影响,比之其他各家,要大得多了。

但为什么纵横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一直被人漠视,得不到正确的评价?我想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在起主宰作用。人们评估古人时,总是着重在道德的层面上,这样纵横家就难于得到全面、公正的对待。

我们向往未来,总是希望出现一个“善”的世界,但在过去的时代,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却是人的欲望,是“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介绍了黑格尔有关人性恶的学说后,进一步申述道:“黑格尔所说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个新的进步都必然是对于某一种神圣事物的凌辱,是对于一种陈旧、衰亡、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乱。另一方面,自从各种社会阶级的对立发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可作为这方面的源源不绝的证据。”以此观察战国历史,可以提高我们认识问题的深度。诸侯相互残杀,进行兼并战争,所谓“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纵横家于中取利,但也推动了统一天下的进程。这幅血染的图画,不正是人的贪欲在起作用么?不是可以用作“恶”推动历史前进的生动事例么?

《汉书·艺文志》中论纵横家时说:“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

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班固用儒家的标准衡量纵横家的活动，自然会有如此严厉的批判。他追溯纵横家的历史渊源时，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则是从二者职务上的相似之点着眼的。二者之间，由于时代不同，当然会有巨大的差异。诚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中说的，“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期的行人，本为诸侯国中与君主出于同一宗族的卿大夫，他们与君主之间有着血缘关系，利害相同，自然不会利用外交活动谋取私利了。纵横家的情况不同，他们与服务的诸侯无血缘关系，一般来说，他们出身较低下，四出活动的目的，就在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这与前时的行人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他们没有前人委贄为臣以性命相许这一近乎宗教信仰的原则作为自处之道，在他们来说，个人利益高于一切。

时代不同了，知识阶层所受的教育，所接受的训练，也与前有别。纵横家的眼界，比之前代行人，要开阔得多。战国时期各国的地域已经大为扩大，政治形势要错综复杂得多。纵横家在分析形势时，往往就人口、都市、地形、物产等总体国力着眼分析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评价各国之间军事力量的优劣，探讨政治发展的前景。春秋时期的行人折冲樽俎时，往往就谈判的具体问题而论，视野相对比较狭窄。战国时期一些杰出的纵横家，可以说是具有战略眼光，视野相当开阔。他们具有高超的外交手腕，有力地操纵政局，使纷纭扰攘的世界逐渐出现平静稳定，中国终于步入了“分久必合”的一统天下。

假如我们用求实的态度来考察纵横家的说辞，自然会发现很多不符实情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具体问题应当考虑。一是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社会上还未发展出各个门类的科学，因此人们掌握

的知识必然会有很多局限,后人于此不应对纵横家有过多的要求。二是纵横家在游说诸侯时,为了耸动人主,往往故意夸大事实,甚或捏造事实。但后人如用文学的眼光加以审视,则又可以认为纵横家所使用的也就是夸张、虚构等手法了。

中国富有文学意味的散文就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纵横家在游说人主时,固然注意分析,但因面陈利害,注意大处着眼,不把细节上的精确放在首位。他们以口辩说服人主,故首重气势,让人主几无进一步思考的余地,首先就被他们的说辞所折服。

战国时期各学派的代表人物无不奔走四方,游说人主,争取他们的支持,使本学派的主张得以实施。因此,他们的作风与纵横家都有相通的地方。就以儒家中的代表人物孟子来说,其说辞也是滔滔汨汨,气势慑人。所不同者,他在论述时时而加入道义上的说教,不是一味分析政治形势就是了。

墨家与法家的散文较重逻辑,但因这两个学派自汉代起就处于非主流地位,因此在中国散文史上,不占主要地位。而在文学领域中一直占主要地位的,是呈现雄辩风格的纵横家和儒家中孟子一派风格。

但如上所言,后人每对纵横家持偏见,故而纵横家在各方面所起的作用往往受到漠视,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没有得到正确对待。这既不合乎实际,也不公平。处在目前一切要求价值重估的情况下,学术界应该对纵横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作出全面而正确的评价了。

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郑杰文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纵横家的研究,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从纵横家的事迹、理论、文学创作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系列成果。有关纵横家的记载,零碎且多矛盾,这就需要进行考辨。杰文在《中国古代纵横家论》、《鬼谷子天机妙意》等系列著作中,对存在

的各种有关著作都进行了深入的钻研。他的研究工作,都植根在可信的文献考辨的基础上,并非时下一些望空立论的著作可比。他对纵横家的多方阐发,言必有据,具有说服力。《战国策文新论》中的文字,同样具有上述特点,读之自明,这里毋需我再饶舌了。

总的看来,杰文的这一系列著作填补了先秦诸子研究的空白,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中国哲学的全面认识,可供学术界参考。《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长期被遗落的一环,终于被有识之士接续上了。对于杰文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眼光与功力,以及业已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希望他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多成果。



序二

董治安

战国之际，七雄竞起，百家争鸣。应时出现的一批辅所用之主的策士，行机谋权变之事，倡纵横长短之说，“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所作为，以及由此展示的其与儒、道、法、墨等各家大异其趣的思想学说和审美倾向，构成了晚周政治文化史上斑斓多彩、引人注目的一页，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影响深远。太史公于《史记》“本纪”、“世家”和“列传”中，一再引述秦并六国过程中策士们的言行，肯定其作用。刘向在《校战国策书录》中称：“（策士）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亦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班固据刘歆《七略》所撰《汉书·艺文志》，既收《战国策》于《六艺略·春秋》类，又于《诸子略》举“纵横家”为“九流十家”之一，收列其著作，复择纵横家论兵之言重载于《兵书略·兵权谋》类，都可看出汉人对于战国策士（纵横家）及其著作多方面的注意和推重。

然而，年代久远，典籍散佚，今人所见战国时代的文献，已经数量很少；有关策士活动的载记，特别是纵横家们的论著，多已湮没不见。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先秦纵横家著作，如“《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庞煖》二篇”、“《闾子》一篇”等，俱早已亡

佚。传世的《战国策》一书，原系晚周策士说辞和行事记录的选编，刘向所见“战国策书”已经“错乱相糅莛”，其“哀合诸记，并为一编”，却疏于策文的编年，史实的窜乱甚至“主名”误置并不乏见；流传中也有新的缺损和谬误。1973年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仅存27章，数量有限，且多残缺。至于汉人著作（如《史记》等）载述的若干资料，又往往不无增删润饰之处。凡此，都为战国纵横家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另一方面，长久以来，人们基于传统儒学的标准，对于晚周谋臣策士言行，往往持简单否定的态度。比如，北宋时曾经对《战国策》作过重新编校工作的曾巩，就认为“战国之游士”违背“先王之道”，“其为世之大祸明矣”，声言自己传布此书，不过是要“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参见《战国策目录序》，《元丰类稿》卷十一）；明清之交的陆陇其，也斥战国纵横家言“其机巧之变，足以坏人心术”。他为了“使学者知其所以异于《孟子》者”，竟纂著了《战国策去毒》一书（参见《战国策去毒》跋语）；都是较为突出的例子。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复杂历史现象的深入研讨，阻碍了对纵横家思想学说和文化创造之充分、必要的探究。迄于现代，在先秦“九流十家”中，纵横家的研究，基本尚未改变相对滞后的状态，应当引起注意。

郑杰文同志自90年代初以来，潜心于先秦纵横家的研究，1993年出版了《鬼谷子研究》三种，被誉为“鬼谷子研究之大成”。1995年出版了45万字的《中国古代纵横家论》，从历史源流、代表人物、活动特征三个方面，对先秦纵横家和纵横学作出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论析，是此一方面带有总结性和重要学术价值的一部研究专著。即将问世的这部《战国策文新论》，无疑从以上两项课题的完成中获得了必要的资料积累和一定的学术准备，同时也展现出作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前进、新的创获。古人说：“鍤

而不舍，金石可镂。”近10年来，作者正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纵横家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攀登着一级又一级新的阶梯。可以说，《战国策文新论》的完成，标志着作者关于晚周纵横家研究在精深方面又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殊为难得。

《战国策文新论》是对现存一批晚周时期的“策文”及其文学成就进行系统考辨和深入论析的专著。其重要学术贡献，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文献考辨、特别是策文断代上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有值得重视的学术突破。如上所说，仅存几种有关纵横家之文献资料的散乱和缺误，是长期以来困扰研究者的主要问题之一。明清以来，在《战国策》文字校勘和具体内容的考辨上，几代学人做出不少的成绩；而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出土后，研究者更从与帛书的对照比勘中，澄清了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内容的一些模糊费解之点，以及若干史实记载的误倒、个别人物的张冠李戴等等；但是，在一系列个别考订的基础上，对保存于《战国策》等文献中的一批晚周策文给以系统的梳理和科学的说明，变其散乱无序为有序可寻，依然是纵横家研究中一个带基础性而又有相当难度的重要课题。在《战国策文新论》中，作者通过《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和《史记》的仔细对比考索，对于三种文本资料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推断，肯定了三者各自毋庸置疑的文献价值；进而在综合利用前人成果和补充考辨的基础上，就多达300余章策文的产生时间加以考定，并依据把战国时期“合纵连横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的理解，确认“初创”阶段策文90篇，“鼎盛”阶段策文134篇，“持续（及衰亡）”阶段策文98篇。书中有关具体问题的处理，或不无可商之点；然而，从总体看，作者对一大批策文所作的这种创造性的断代处理，无疑进一步开发了《战国策》等古老文献的历史价值，从而大有助于对纵横家活动之更准确的了解和更科学的评价。可以说，这是

在前人基础上,作者有关纵横家研究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学术开拓。

其二,对纵横家文学创造的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作出了堪称精到的论析和总结。关于《战国策》的文学成就,千余年来,论者可谓已经不少。然而,古代学人多限于对其“文辞之胜”的肯定,当代文学史家往往又难以摆脱传统的道德评价,或者过于拘泥于“历史散文”之定性,都多少使得这方面的学术研究陷于不易拓展的境地。在《战国策文新论》中,作者提出,现存策士说辞和行事记录兼具“史籍”和“子书”两种文体的不同特征,由此出发,进而缕析了《战国策》在我国古代记叙文和论辩文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与双向推动作用。这是一个尊重事实而颇具史识的新说。此一见解,能与《汉书·艺文志》(既收《战国策》于《六艺略》,复列“纵横家”及其著述于《诸子略》)相合,有补正于学界对《战国策》文学成就的一般理解。作者在深入考辨的基础上把战国策文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具体阶段,不仅对于晚周散文、而且对于这一阶段整个文学演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此外,书中认为:纵横家记叙文是由“记事为主”的先秦历史散文,向以“写人为要”的汉代史传文学“过渡的桥梁”,非统观前后、洞悉流变难以有此确论。书中又认为,战国“论辩策文”成就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在于其“文情”的丰足、“文气”的充盛;这与只以形象或文辞论《战国策》得失也迥乎不同,而为我国古代散文的文学评价,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的标尺。

1995年以来,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作者为撰著《战国策文新论》付出了超乎常规的辛勤努力。如今,全书已经完成,即将出版,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就杰文个人而言,都是值得高兴的事,因述自己所见如上。一部高质量、有创新的学术著作,相信读者是会给予客观理解,作出正确判断的。

目 录

序一	周勳初(1)
序二	董治安(1)
第一章 战国策文的文化渊源	(1)
第一节 行人之官与纵横家	(1)
一、“诸子出于王官论”辨	(1)
二、夏商西周通使官及其学说	(15)
三、春秋行人之行事及其学说	(20)
四、战国行人之行事及其特点	(24)
第二节 古代谋略学与纵横权谋	(26)
一、太公谋略与纵横权谋	(26)
二、兵家谋略与纵横权谋	(37)
三、政治谋略与纵横权谋	(55)
第三节 古代辩术与纵横说辞	(67)
一、政治论辩与纵横说辞	(67)
二、外交说辩与纵横说辞	(71)
三、学术诘辩与纵横说辞	(77)

附：战国策文的出现是多种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

结果····· (83)

第二章 战国策文的产生和传播····· (85)

第一节 策士的纵横活动及战国策文的产生····· (85)

一、策士的纵横游说活动····· (85)

二、策士说辞的类别和特点····· (86)

三、策士说辞和行事的记录····· (88)

第二节 战国策文的传播和《战国策》的编定····· (91)

一、战国策文的传播····· (91)

二、战国策文的原始结集····· (94)

三、战国策文的原始结集人····· (97)

四、战国策文两火未尽焚····· (100)

五、《战国策》的编定及流传····· (106)

第三节 《战国策》的部类和文体····· (109)

一、《战国策》归部的争论····· (109)

二、《战国策》从形式上看是史著····· (111)

三、《战国策》有较多子书因素····· (114)

四、《战国策》是一部以记叙文和论辩文为主体
的散文集····· (117)

第三章 战国策文杂考····· (119)

第一节 《战国策》“主名误”考辨····· (119)

一、《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章之“魏惠王”乃
“魏襄王”之误辨····· (119)

二、《赵策四》“齐将攻宋而秦楚禁之”章“谓齐
王”者乃“苏秦”而非“李兑”考····· (120)

三、《韩策三》“韩人攻宋”章之“韩人”、“韩珉”即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之“韩旻”考	(122)
四、《秦策二》“陘山之事”章之“苏代”乃“苏秦” 之误辨	(124)
五、《齐策五》“苏代说齐闵王”章之“苏代”乃“苏 秦”之误辨	(125)
六、《赵策四》“五国伐秦”章之辞主系“苏秦”而 非“苏代”考	(125)
七、《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章之“苏代”乃 “苏秦”之误辨	(125)
八、《燕策二》“苏代为奉阳君说燕于赵以伐齐” 章之“苏代”乃“苏秦”之误辨	(126)
九、《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章之“苏 代”乃“苏秦”之误辨	(127)
十、《燕策二》“客谓燕王”章之“苏子”当为“苏 秦”考	(128)
第二节 《战国策》“无主辞”考说	(128)
一、《东周策》“谓薛公”章之辞主当为苏秦	(129)
二、《秦策三》“谓应侯曰武安君禽马服子乎” 章之辞主当为苏代	(131)
三、《秦策四》“说秦王曰物至而反”章之辞主 当为黄歇	(131)
四、《赵策三》“说张相国”章之辞主当为鲁仲连	(131)
五、《魏策二》“五国伐秦”章之辞主当为苏秦	(132)
第四章 战国策文的奠基阶段	(136)
第一节 战国策文与考察战国策文的基础文献	(136)
一、战国策文概说	(136)
二、考察战国策文的基础文献	(138)

三、考订战国策文作时的原则	(150)
第二节 合纵连横的初创与初创期策文之作时	(156)
一、合纵连横的初创期	(156)
二、初创期策文之作时考辨	(157)
附：托名张仪说辞之产生年代考辨	(175)
第三节 初创期策文之文学水平	(183)
一、初创期策文的类别和篇幅	(183)
二、初创期策文的文学表现水平	(187)
第五章 战国策文的发展阶段	(192)
第一节 合纵连横的鼎盛与鼎盛期策文之作时	(192)
一、合纵连横的鼎盛期	(192)
二、鼎盛期策文之作时考辨	(194)
附：托名苏秦说辞之产生年代考辨	(222)
第二节 鼎盛期策文之文学水平	(236)
一、鼎盛期策文的类别和篇幅	(236)
二、鼎盛期策文的文学表现水平	(238)
第六章 战国策文的成熟阶段	(248)
第一节 合纵连横的持续与持续期策文之作时	(248)
一、合纵连横的持续期	(248)
二、持续期策文之作时考辨	(249)
第二节 持续期策文之文学水平	(266)
一、持续期策文的类别和篇幅	(266)
二、持续期策文的文学表现水平	(268)
附一：《战国策》之不明作时文和拟托文的文学价值	(275)
一、《战国策》之不明作时文的类别和文学价值	(275)